

◎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 ◎

宋代军政研究



..... 陈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 ◎

宋代军政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军政研究/陈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004-8958-0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军事史—研究—中国—宋代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E294.4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700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05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编委会

主 任 陈 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刚 田旭东 吕卓民

岳 琰 徐卫民

总 序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她不仅记录着人类、民族、国家及社会的发展演变历程，传承着文明的智慧和种子，而且昭示着未来的趋向。人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她为当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实，历史又是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因为她提供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能更理性地把握和认识现实。

当今，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日益面临诸多紧迫而又深远的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与环境破坏、技术突变与道德危机、经济差异与社会和谐、文化宗教融合与冲突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矛盾。这些困扰人类社会以及各国发展的矛盾，固然是现实问题，其实都存在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演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站在更长远的时间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分析，对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无疑具有更大的益处。这便是历史学价值的现实体现。

西北大学的前身为陕西大学堂，创立于1902年。此后校址校名几经变迁，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又一度与内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共同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其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直至今日。

西北大学历史学科，自1937年正式创建以来，一直是传统优势学科。数十年来名家辈出，如黄文弼、马师儒、王子云、侯外庐、陈登原、马长寿、史念海、陈直、张岂之、彭树智、林剑鸣等著名学者先后在此执教，并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

从国家“九五”建设以来，历史学被列入西北大学国家“211”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得益于此支持，西北大学历史学科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古代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陕西省重点建设学科，并承担着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分任务。

近年来，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人们，在名家前贤雄厚的研究基础上，又围绕诸多专题展开了探究，如在先秦兵学文化、秦汉历史文化、秦汉历史地理、唐代军政问题、宋代治国理念、宋代军政问题、中国古代羁縻政策以及西北史地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的学术研究，我们将推出若干研究著述，以《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之名陆续出版，希冀得到学界的关注和批评指教，以嘉惠学林。

本丛刊的出版，得到西北大学“211”工程办公室的支持，并得到学校“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和陕西省重点学科经费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在审阅和编辑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先生以及责任编辑付出了许多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陈 峰

2009年12月于西北大学

目 录

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	(1)
现实应对与精神抵触	
——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武力战争观及其实践·····	(18)
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42)
从枢密院长貳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	(56)
北宋“将门”现象探析	
——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	(72)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状态的转化及其影响·····	(91)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101)
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	(111)
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	(125)
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	(137)
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	(152)
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	(164)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177)
从呼延赞事迹看宋初朝政路线的演变·····	(186)
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196)
宋朝儒将的角色与归宿	
——以北宋张亢事迹为中心考察·····	(207)
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失败·····	(219)
“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	(229)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	(239)
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	(252)

简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	(257)
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	
——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	(265)
从“文不換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278)
何去非的选择与宋朝社会风尚、价值观的转变·····	(291)
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	(296)
北宋讲武礼初探·····	(307)
宋代的军将和军大将·····	(320)
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述略·····	(323)
南宋的机速房与边防·····	(330)
中国古代阵法演化概论·····	(342)
“入乎于情,近乎于理”	
——《北宋武将研究》评析·····	(351)
《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读后·····	(357)
2000年以来宋代军政研究概述·····	(362)
后记·····	(388)

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 思想与方略的形成

宋朝历史上，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方略与以往发生很大的转变，即长期贯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之下，其内政以及边防都深受影响，乃至形成有宋一代独特的气象。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虽已有一定论述，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故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专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加以论述。

一 “崇文抑武”概念的提出

关于宋朝历史上存在的“重文轻武”问题，早已为学者所关注，并几乎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前辈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指出：“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①漆侠先生认为：“重文轻武的含义是，重文事，轻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位，丝毫不重视养兵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②邓广铭和漆侠两位先生的论述可谓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黄宽重

^① 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它不但是中国转化为近代型的时期，而且由于它重文轻武，声容盛而武备衰，是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时代。”^① 不过，学术界虽对“重文轻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认同，^② 但对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还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了批评。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学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视文官及文事，轻视武将及武略这样的事实。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几乎无不谈“兵”等事实，认为宋最高统治者重用文臣，采取抑制武将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恰恰是“惧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③

基于宋代文官、武将之间权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将的具体事实，更重要的是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贤“重文轻武”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历史发生的实际全过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认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仅仅是改变了个别字眼，而是对“重文轻武”概念的发展，既可避免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理解上的误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宋朝的统治思想及治国方略，在更高的层面上透视当时“抑武”的动因及其影响。

综观宋朝历史，“崇文抑武”是一种极其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倡和贯彻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宋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

①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 持宋朝存在“重文轻武”看法者颇多，散见于许多关于宋代的论著之中。又以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一文为代表，《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以宋衍申《是“重武”不是“轻武”》一文为代表，《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领性的治国思想与方略。它源于专制集权主义，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强化了专制皇权。它还与“守内虚外”密切联系，意味着不仅凭借军队，而且凭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

二 宋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的萌芽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①数十年间，王朝更迭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②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③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④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于是，宋建国不久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七，至道元年五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5页。

② 范祖禹：《帝学》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德] 傅海波、[英] 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④ 《宋史》卷二五〇《王彦升传》仅记载王溥被敲诈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29页；而王曾《王文正笔录》则称王溥被迫“遗以白金千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唯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最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朝，对武将采取的直接打压手段，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更戍法”之类收兵权的举措，将功臣宿将罢为闲职，将藩镇的事权予以剥夺。与此同时，又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分别担任军队要职。这样便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军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①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②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③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因骚扰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

①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32页；《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0页。

② 《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第293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①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②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③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④

其五，重视科举制度。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覬觐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⑤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⑥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⑦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⑧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

① 《长编》卷一五，开宝七年二月庚辰，第317页。

②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六月辛卯，第68页。

③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④ 范祖禹：《帝学》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⑥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33页。

⑦ 文莹：《玉壶清话》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⑧ 范祖禹：《帝学》卷三。

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①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三 宋太宗朝“崇文抑武” 思想方略的确立

宋太宗登基初宣示：“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②在昭示继承成宪的旗帜下，沿袭“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宋太宗称帝是通过篡位所实现，^③因此对臣下加意防范，其中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这便是其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教训尤大。从此，宋太宗统治集团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④即显然是主要针对武将所言，而非日益获得倚重的文臣。分析同年宋太宗与臣下的另一段对话，就不难进一步说明问题。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于

①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第12940页。

② 《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冬十月乙卯，第382页。

③ 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丁亥，第719页。

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①

可见，宋太宗君臣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主要潜在对象。清初人王船山即针对宋太宗朝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② 因此，对武将加以压制乃至打击，以制约其政治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坛和全社会营造崇文气象，以贯彻儒家道统，成为当政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宋太宗登基后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崇文抑武”思想与方略的顺利推行，并基本确立其在治国各个层面中的根本地位。

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宋太宗朝进一步对武将处处设防。例如：

宋太宗即位后，逐步将宿将转为虚职、闲差，而起用了资望俱浅的武将掌管禁军，以达到既铲除乃兄遗留禁军将帅的目的，又获得降低高级将领影响力的结果；

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将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给予他们殿前承旨的武职头衔，实际上等于将其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③

在北伐幽州失败后，宋太宗不仅逼死了皇侄赵德昭，而且通过贬责从征的重要将领石守信、刘遇等人，^④ 严厉地教训了带兵武将；

雍熙元年，宋太宗亲自考核禁军各级军官，“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值得注意的是，其要求武臣的主要标准在于“循谨”的条件，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自是，率循其制。”^⑤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由于对武将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所以宋太宗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⑥ 如怙惠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更多地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官的行动等。

① 《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正月乙酉，第710页。

②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页。

③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第401页。

④ 《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戊申、甲寅，第459—460页。

⑤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第573页。

⑥ 王曾瑜先生对此已有深入论述，参见《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7—330页。

宋太宗还对兵家学说及兵武气息表现出贬损和怀疑的态度。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记载：“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据《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赞传》记载：猛将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但宋太宗对其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

在打压武将群体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地推行“崇文”的方针政策。有关的具体史实主要有：宋太宗在位期间，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表示对儒学的尊重。^①而对武成王庙仅光顾过一次。^②

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操持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对他们超等任官，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③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决心。“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④此后，科举得到空前发展，大批举子由此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队伍的主力军。

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藪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又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时人评说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⑤

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三衙将帅也来参观，所谓：“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⑥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

①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第2547页。

② 《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第801页。

③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第394页；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科举恩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4页。

⑤ 苏耆：《次续翰林志》，洪迈《翰苑群书》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九月己未，第739页；《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第9176—9177页。

殿”，^① 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崇文抑武”方略的深化。

宋代文献中有关宋太宗表示崇儒重文的记载还有颇多，如宋太宗曾对近臣曰：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见布衣缙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②

史称：“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③ 宋太宗本人也颇好翰墨，常为臣下馈赠所书字幅，^④ 因此赢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⑤ 集中表达了士大夫对当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既失去用兵的信心，由急于建立不世之功转为怯懦惧战，又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⑥ 遂放弃了收复燕云的重大边防战略，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厉行加强其专制的统治，实行“守内虚外”之策。^⑦ 于是，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因循”、“防弊”成为施政的重要信条。

揆诸宋太宗朝形势，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已重新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这就决定了士大夫地主必须更紧密地与专制皇权相结合，效忠最高统治者。因此，在人主过分强化皇权统治和因循治国理念的左右下，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也势必成为保守政治的参与和贯彻者。

历仕宋初两朝的重臣赵普，就是当时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其不断焚

① 《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寅，第544页。

② 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二六，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 范祖禹：《帝学》卷三。

④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四、六之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70—2271页。

⑤ 李昉：《御书飞白玉堂之署四字颁赐禁苑，今悬挂已毕辄述恶诗一章用歌盛事》，李昉：《禁林宴会集》，洪迈《雍熙群书》卷七。

⑥ 《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5页。

⑦ 参见本师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